革方案都包括用更为自觉的社会或政治管制方式来替代私人产权或个人契约自由。这类研究背后的一个假设是,如果人们认为一种制度有待改善或改革,那么,在清楚地理解了这一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的情况下,真正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并会为国民带来更美好的前途。因此,这本著作将努力把规定自由企业制度的那些本质特征分离出来。自由企业制度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保证和指导人们相互协作的机制或方法。完成这一任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把现象描述和解释与制度辩护或批判清楚地区别开来。我们要首先描述这个制度,然后才有可能说明这一制度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与此相联系的一个目的是对有关经济组织问题的事实进行系统的说明,这些事实是任何组织制度都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是不可改变的。有了关于这些基本层面的严格而清楚的概念,我们才有可能回答下列问题,我们能够期望的合理的组织方法是什么?这一制度是否因为没有实现理想的结果而受到指责?它的缺陷在何处?什么类型的制度变革能够提供充分的改善机会,从而值得我们去尝试?

这样的研究并不是为现有的社会秩序辩护。相反,这样的研究是为了说明自由企业制度的固有缺陷。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认真的分析也强调了这一问题的根本困难,并使那些对社会制度变革抱有过高期望的人们显得愚昧和不切实际。这本著作研究的范围仪限于这方面的奠基工作,或者说仪限于经济理论范围之内。要对社会政策问题作出最终结论,我们还要研究其他可能的组织制度类型,并将这些组织制度与自由企业制度进行比较。但是,要给某一个制度下"结论"也许是有害的,因为任何一种组织方式都不可能完全满足诸多领域中的所有目的。毫无疑问,在终极社会中,能够想像出的每一种组织机制都能够找到它的用途,这样,问题也就变成了说明每一种组织方式最合适的任务和领域。

本书对自由企业制度理论做出的具体贡献是,全面认真地研究了这一制度中的"核心人物"·····企业家才能及其报酬决定因素。1914年春天,时任康奈尔大学教授的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博士建议我把利润问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在约翰逊博士离开后,我的研究主要是在继任的阿林·A·扬(Allyn A. Young)教授的

指导下完成的。我衷心地感谢两位恩师的指导和帮助。1916年6月,我的论文在康奈尔大学获准通过,1917年被选送参加哈特许厄福讷暨马克斯(Hart,Schaffner&Marx)论文竞赛。此后,在芝加哥大学 J. M. 克拉克(J. M. Clark)教授的指导下,我重写了这篇论文。我与我的同事 C. O. 哈迪(C. O. Hardy)教授之间的讨论使我获得了很多启示,而有机会阅读他的未出版的《风险和风险承担文选》(Readings on Risk and Risk-Bearing)则使我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教授认真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校样,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应该提到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人,正文和脚注中所提到的只是那些公开出版的著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一一列举的确过于冗长,况且也不胜枚举。

**奈特** 1921 年 1 月干艾奥瓦

# 再版前言

Χİ

本书已经脱销。伦敦经济学院通知我,本书将有幸列人该院的一套再版丛书;我也有幸获准写一个新的前言。但是,我并没有详细地修改本书的内容,甚至没有更正其中的错误,仅仅想借此机会谈谈本书所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以及那些已经为人们接受的一些经济学理论可能发展的方向,假如人们希望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话。在这里,我向我未来的读者做如下几点声明。

### T

第一,正如本书的内容所表明的那样,自从我关注经济学以来,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经济学理论的含义、必要的假设条件,以及理论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不一致性。这本著作的绝大部分最初写于 1915 年和 1916 年,是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自那时起,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研究兴趣。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大学里讲授"经济学理论"课程。这一时期,尤其在美国,是

普遍盲目反叛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为把经济学传授给一大群对科学或社会利益没有兴趣的学生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当时欧洲民主国家中所存在的偏离自由主义的政治动向,使我深感困惑。我尤其希望弄清楚各种可能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关于这个题目,已经有很多令人困惑的讨论。我努力的结果是方法论以及体系顺序之类的东西,其实也属于方法论的范畴。用其他研究方法来取代价格理论(经济学)的建议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但人们对它的反感却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希望知道,在价格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它可能发挥什么作用,不能发挥什么作用。

在以功利主义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中,就"功利"一词的确切含义来说,所有经济理论都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和无内容的。在一般意义上,它研究的是特定形式的经济原理,不考虑要经济的是什么或者如何经济。更具体一些说,价格经济学研究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中,每个人都把其他人和社会当作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和条件,这就是所谓"克鲁索(Crusoe)经济"。它讨论的是人们如何利用给定的资源和技术来满足自己的既定需要,这一切都是通过完备的市场体系组织起来的。至于在任意给定时间和地点会遇到什么样的资源和技术,这是制度史问题,因为所有这类事情与客观存在的市场关系本身一样,显然都是文化历史的事实和产物。(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动机和过程意味着,通过正确分配资源的用途,最大程度地实现某种给定的目标,而且资源在每一种用途上的使用都服从报酬递减规律,这也许是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第xii页。)

不过,就驱动该体系运行的"需要"而言,价格理论固有的无内容的说法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需要"必须被看做对生产、买卖、消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但是,从某种更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样的需要是非现实的、抽象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只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是对其内在属性的需要,它们更多的是一种目标的象征,其实质是某种社会联系和理想价值。古典经济学家们犯有两个致命的错误(另外一个将在后面说明),这两个错误都把食物和吃饭当作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事情。事实上,吃饭就其本

ΧÏ

ΧÜ

身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利益,而且,对于穿衣这类事情作最低限度的考虑也会赋予经济学研究完全不同的色彩,更不用说更高层次的需要了。人们当然需要营养和其他保持身体舒适的必需品,但是,即便是满足这样的需要,实现需要的手段也依赖于由历史形成的社会标准。在借助于市场满足的大部分需要中,因商品和服务内在的质而产生的对商品和服务的欲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一个十分明确的动机衡量尺度对经济生活进行更深人、更切实的研究,其刻度的起点是纯经济层面。在这个层面上,物质手段被用于达到某种目的,而这一目的从量上说是所使用工具的一个功能。下面,我们将用一个简要的、不全面的列举来说明这一尺度的本质。

与生存和舒适相比,"需要"更多地属于审美的层面。审美感 觉上的吸引力以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方式依赖于内在的质。它在多大 程度上符合一种文化的稳定特征? 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时尚或社 会历史的偶然?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一直是潜伏在经济学争论表层 之下的最引人入胜的问题。需要与美感要素大量重合的部分是具体 商品所象征的纯粹的社会需要,比如,在体育比赛中的获胜欲望。 社会需要大多表现出两极化的形式,比如,服从习惯与标新立异, 自由与权利等,我们永远不可能将它们完全清楚地区分开来。另一 个要素是制造某种印象的欲望,形式更加多种多样,从天使到魔 鬼,或广泛地沿刻度分布,或形式上没有差别。不那么直接地具有 社会性的动机也拒绝符合经济模式,比如,亲昵和新奇的魅力,有 着出人预料的特殊内容的行为和成就所具有的趣味,以及对更具广 泛性的利益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我在这里亦发现了这本著 作关于不确定性分析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很多经济学家都把结果的 不确定性当作选择问题来研究,好像它是基于已知的数学概率的一 次赌博,这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尤其无法理解庇古(Pigou)教授 在其《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附录1中,把不确定性 当作一种要素的观点。也可以说,我根本无法理解他关于要素的一 般概念。)

最后, 非理性动机成分中最具实践意义的是价值评估。在我看

ΧİV

来,在人类大部分有预谋的行为中,人们都希望自己的观点和预测是正确的。但是,获得某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或最优答案的愿望并不等于对某种具体结果的欲望。当一个人沉迷于某一问题时,他甚至不希望别人给他一个正确答案。对于经济学理论来说,这些结果有着更深远的意义。经济学理论必须讨论某种意义上的行为目的,不然就会失去与经济学概念的一切联系,成为一种根本不讨论经济问题的空谈。但是,惟一能够成为科学证据的目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存在于一个人大脑中的对一件事情或一种情形的欲望。目前,若干社会心理学学派关于逻辑理论的一致看法是,绝大多数有意识的欲望最终是在某种类型的社会中扮演某个角色,成为某种类型的人。有人指出,个人和社会理想并不能用物质结构来描述,从而对它们的描述也不可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以至于称得上是"科学"。这样的内容更多地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比如,好还是坏、聪明还是愚蠢)。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困难到此为止。对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来 说,同样重要的是,一要认识到存在这类事情的描述,从自然科学 意义上说,是不科学的;二要清楚关于这类事情的描述,随着讨论 的深入,必定会进入更加麻烦的领域。一旦开始讨论这类理想,人 们就会求助于命令性的规范,即试图通过规范或道德水准来解决问 题。由于关于理想的讨论不可能限于纯粹的描述,所以规范性描述 是可能的。事实上,对于所有科学来说,这一点都是正确的。需要 描述的是—个观察者应该看到什么,即如果他是正确的,他将看到 些什么。其他描述则完全是自我揭示,是内心的暴露,而且赋予它 的任何意义都是文学的, 而不是科学的。所以, 任何社会科学都意 味着承认并研究"现实的社会价值观"。这一点的意义在于,经济 学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政治和伦理的成分。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 成为一种科学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它在不同层 面上表现出的描述与价值评估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困难在于,解释 者的趋向往往是反方向的:一个对事实感兴趣的人不得不去强调真 理的实践意义:一个对政策感兴趣的人也许会通过给自己的观点披 上科学客观性的外衣来增强其说服力。由此出发,经济学理论在澄清 价格与价值、分析与宣传之间的关系方面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

X٧

XVI

####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按照不同行为、行为中的不同方面或各方面受关注的程度来划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六种:

- (1) 不带有主观或人为成分的物质材料、商品和价格统计研究。此类研究只能说大致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为商品的实用价值和物质性质必定会进入商品的分类之中。
- (2) 把动机作为事实的研究方法。撇开经济学家的政治观点,这一方法或多成少地接近于传统经济学。但是,由于只有把动机与观察到的行为结果结合起来才能进行客观的界定和分类,所以,如果它要披上客观性的外衣,这一方法就会与第一种方法混合在一起。如果它要切实地研究动机,它就必须承认动机是抽象的,是与社会规范相联系,并且有别于现实行为的。原因在于如下具有双重意义的错误: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错误和目标本身的错误。

(3) 承认动机中包括社会象征和伦理等成分。从人情味方面来说,这会使研究显得更现实、更真实;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方面来说,这会使研究显得不那么科学。

- (4) 方法(3)与社会政策方面的考虑混在一起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在这样的研究中,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还是存在的,即把政策与结果当作事实来对待。不过,这些概念与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大相径庭,因为这里涉及到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博弈规则、不同种类的博弈或者说社会制度的结果。科学的工具主义也许会设想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竞争关系,一个人会尽量利用他人来达到他自己的私人目的。其实,这些都是无法借助于科学方法来做到的,因为其中所采取的技巧主要是强制、劝说和欺骗等,而在自然物体之间的关系中,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社会结果的这一特征无须评论。
- (5) 公然说教或宣传研究者希望的政策。经济学仅仅在有限意义上是一门科学,然而,对于这样一种经济学来说,渴望的事情与能够渴望的事情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实中却常常将它们混为一谈。结合(4)和(5),具体意义上的目标与社会关系形式上的目标之间的区别也是至关重要的。对自由这一抽象社会关系的研究严重破坏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些经济学家们不仅混淆了言论自由与自由制度分析之间的区别,而且还以一种极为错误的方式把自

ΧVİL

XVIII

由想像为实现最大幸福的一种手段。从经济福利的角度看,人们自己作出的选择要比别人强加给他的选择更为明智。不仅如此,人们肯定也需要自由。显然,自由本身有可能被当作一种价值、一种义务,所有现代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都是如此对待它,并禁止个人出卖自由的。(在很多情况下,当政府试图做它无法做到的事情并有损国家机器的功能时,作为一种替代,人们就会提倡自由。) 古典经济学家们还忘记了,经济自由是使用经济能力的自由,从自己做奴隶到奴役他人,具体内容取决于经济能力的分配。他们甚至借助于人们改善自己处境的欲望,但没有考虑到利用能力来得到更大能力的自由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6) 方法大部分是由历史和历史的偶然性造成的。正如我们已 经指出的那样,每当解释超出了静态经济的抽象假设,要论及内容 或内容的变化,就会出现不同的方法。用经济动机解释历史变化并 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第一信条,并 被很多从未对其进行过认真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囫囵吞枣地接受了。 (当历史学家们对历史进行经济学解释时,经济学家们却日趋走向对 经济学的历史解释。正如很多心理学家是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者, 而物理学家则变得越来越感性、越来越理想主义和罗曼蒂克。) 总 之,影响经济生活的条件变化本身是能够用经济学解释的,只要这 些条件变化是理性的节制(不是"等待")和投资的结果。这个结 论适用于三个领域中的变化,分别影响到需要、资源和技术,但这 并不意味着现在与将来之间的权衡类似于经济学比较。除了已经指 出的经济动机观的局限性之外,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必然意味着一 个相当直接的、确定的、可预见的"牺牲",而未来能够得到什么 却是间接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遇见的,甚至明知这些会超出选择人 的寿命。经济发展包括"现在商品"转变为收入的永久转换,其实 是短期的大笔收入转换为长期的小笔收人。值得怀疑的是,未来的 利息总额是否是这一转换的全部经济理由呢?可以肯定的是,在现 实社会的储蓄和投资中,这样一种利益即便发挥作用,作用也很 小。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动机儿乎总是或者全部都是消费的真正 动机,是象征性的、抽象的。

ΧİΧ

####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我认为,古典经济学传统的一个主要错误在于古典经济学传统 从未明确地、正确地区分在给定条件下系统的运行状况,包括向均 衡状态的调整过程,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系统条件与系统本身内容 的变化。最近出现的这类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有人把经济动力 学的概念用于分析历史变化。确切地说,系统动力学概念只能用于 描述在给定条件下系统向均衡状态的调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错误 是,把历史的变化过程当作向均衡的调整过程。就这些词语的确切 含义而言,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这个意思——历史变化定义的表述 还涉及到不可逆性的概念。一般来说,历史变化具有自我加强的趋 势,或者说是积累性。(任何方向的)进步为进一步的进步敞开了大 门,除非中间发生了大灾难或衰落性的神秘道德现象。(历史变化 不应该仅指增长,而应该包括两个相反方向的力量:需求和供给。 把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固定下来都是不可能的,但区别总量变化和总 量不变情况下的形式和方向的变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 I

下面,我们将要详细讨论价格理论在一个历史的、静止的经济中的应用。我想通过几种途径使这些材料更确凿、更切实和更有意义。(在我和其他人的这些观点中,有很多已经受到了出版界的关注,但还没有成为公认的经济学基础。我不认为这些观点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在经济学中,任何极具独创性的观点都会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我可以说这是我 10 多年来的努力方向。并且,这些观点所受关注的程度超过了其应有的程度,读者可能会联想到近期的一些讨论。)

- 1. 几乎所有经济物品和服务的供给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少数例外的情况是,卖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或者生产是指定的。在一定的市场区域内,每一种产品和劳务都有一个垄断者,竞争只能在市场区域的边界发挥作用。均衡条件是增量收益等于增量成本。在市场范围内,价格即产品(见下面)可以分类,也可以不分类。
- (1) 一个供给者可以是一个商业单位或厂商、个人或公司,但 绝不能将其与技术上的生产单位或工厂混为一谈(这有别于庇古的观

XX

XXÌ

点, Pigou, Ec. of Welfare, p. 219)。工厂的规模大小,像机器或建筑设计中的任何方面一样,都是商业单位的技术细节。效率与厂商规模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具体到一个工厂,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问题,并具有历史偶然性,而不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一般原理。但是,这一问题却十分重要,因为垄断收益的可能性提供了厂商无节制地不断扩张的强烈动机,这一动机必须被某种同样有力的不利因素抵消。这个抵消性的力量是,随着规模扩大,即便市场区域边界的竞争存在,(货币收入意义上的)效率也是递减的。

- (2) 一个厂商可能同时沿着多个维度扩张,在理论上,我们有必要发展市场区域或供求区域的概念。地理区域的细节已经受到一些关注,但在我看来,这些还相当肤浅。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区域,它是不同于通常意义的"效用面"。事实上,一种商品必须按照其市场区域(或别的方式)来定义,各种成本,包括运输和各种销售成本,对应着一种商品的不同维度,而一个厂商的维度是它以不同价格或名称出售产品的概括。
- (3) 一般来说,一个厂商的扩张(包括规模变化及其技术单位 在各种维度上的重新安排)无法用一个可逆函数关系来代表,因此, 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均衡状态依赖于各种偶然性和均衡实现过程中的 错误,并依赖于最终需要适应的条件。

XXII

- 2. 最近,人们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的兴趣导致了一个重大 疏忽,这一疏忽主要表现在对经济理论的标准表述中。的确,这是 一个从科学上能够说得过去的疏忽,但在实践上它却是一个严重的 错误。因为甚至经济学教授们也不具有科学头脑,就更不用说社会 大众了。无论如何,这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强调货币理论的困难。 如果一个社会的交换媒介没有任何内在服务价值,其周转速度必定 会无穷大,原因在于影响人们对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减到了零。如 果货币具有单独的效用,其价值将以其效用为极限。
- 3. 均衡概念来自力学,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经济系统的所有因果关系都能够用一个联立方程组来表示,这类方程必须是动态的,否则将没有意义。它们必须包括向均

##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衡的调整过程,而不只是描述均衡状态的条件,它们必须类似于物体的运动方程。这就要求,每一关系所表达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连续的和同时发生的。这一假设显然与事实不符,并会使经济学的概念更加混乱不堪。经济学理论的大多数内容必然包括从因到果的时滞。玩弄力学中加速度那样的概念并不能回避它们,摩擦力这一有害的比喻也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并且它还造成了经济思想中的很多混乱。

XXIII

力学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方法需要进行彻底改革。这里,我 简单地谈谈我对真正的经济动力学问题的看法。经济学中没有什么 东西可以对应于力学中的动力、能量或能量守恒定律。对于经济学 来说。机械运动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只有时间是真实的,没有可界定 的经济空间(因此没有方向或速度),也没有质量。然而,从一定 意义上说,力和阻力的概念是在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中不可避免 的——比其在力学中的应用更为普遍,均衡概念也是如此。在更详 细的联系中,的确存在向均衡调整的趋势。在整个系统中,这一点 也是显而易见的。类似惯性和摩擦力的东西也是存在的,但是没有 质量的惯性和没有能量转换的摩擦力。在向均衡调整过程中,力和 阻力关系是心理上的,它影响着消费者、管理者和生产资源所有者 的学习过程(消除"错误"的过程)。这必定具体为学习实现目的 的新方法和学习的新目的(历史变化),两者极为不同,不过,它 们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线。在行动方面,存在着某种黏性,它部分 地依赖于其自身速度的物质变化的代价问题,更多地则是具有某种 确定性的物质设施的重置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人类。 (服务寿命主要取决于作出承诺的时间或使用期内的预期,正如我 们指出过的那样,经济均衡是均衡实现过程中的偶然细节以及最终。 主导条件的函数。)

XXÌV

即使对力学原理的肤浅研究,也可以说明很多波动——景气或萧条。仔细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周期;结合货币理论的研究,理解商业周期。

4. 接下来要提到的重要问题,关系到从另一个角度看维度的问题,并关系到前面所提到的第二个主要错误,这个错误与把食物

和吃饭当作经济活动有关。最基本的经济量(价值或效用)是服务, 而不是物品。它潜在地是一个流量,通过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过程, 成为一个绝对量,其在交换中的表现形式有:①随时间积累;②资本 化。像食物那样,在一件物品以一定形式或名义使用的时期或寿命 极短的情况下,把物品等同于其服务不会发生重大错误,例如食 物——除非这件物品是一个人积累起来的服务的载体或耐用物品。 但在理论上, 所有财富都是同质的资本(无限可分耐用品的数学极 限情况除外);存在于任何物品中的经济量取决于去掉维护它所需的 东西(和重置)后的净收入,并取决于利率;服务寿命是计算中的一个 细节,如果需要重置的话,重置后的形式也是一个计算细节。资本比 率(利率)取决于预期的新投资的生产力。我认为,其他任何错误都 没有把生产看做财富的生产对经济思想造成的危害更大。生产是借 助于物品(财富)或人来提供服务。财富净增加或减少的核算必须遵 从一个惟一的核算程序,把维护(和重置)费用从收入中严格分离出 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通过有选择地使用经济学术语,以区别资 本财富的变化和与生产和收入相关的消费。

5. 最后,除了阐述上的不精确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历史的错误包袱,即古典经济学体系(指杰文斯-门格尔(Jevons-Menger)之前的体系)的基础性错误。例如,(每当说到成本决定和价格决定时),成本被看做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工资、利息和地租是收入分配的份额;支付不是为了得到服务而是因为作出了牺牲。一方面,生产要素不是具体的能因(agency\*)(自由人及其拥有的能因);另一方面,抽象的资本又表现为人们拥有的能因;再有,如果效用不是一单位(商品或)服务中含有的纯粹抽象的有效激励力量,那么,效用概念也同样有害。诸如此类陈旧的教条还有很多。

Ш

我坚持认为,经济学一定要有社会政策意义——除非经济学家 完全依靠提供娱乐或教人们如何相互利用来维持生计。我先来说明 XXV

<sup>\*</sup> 能因指服务、能力或动作的来源或载体。——译者注

一下我观察到的一个结果——无论是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还是从自由主义时代被认为是人类主要历史成就的价值观的角度看——这一观察结果都无法令人乐观。回顾近年来政府政策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自由贸易的故乡,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靠得住的经济学——实际指"经济的"原理("economical" principle)——指导政府政策的前景都无法令人鼓舞。认真地阅读一下这一时期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就会明白,上述说法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对社会生活及其问题进行更为深人的观察,你就会理解教科书和文献水平不断下降或偏离"自由主义及其所有著作"初衷的趋势。而教科书和文献的水平,正是社会公众判断我们这个职业是否有价值的主要依据。

要寻求更有意义的经济学,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对动机的探究要像慈善活动一样,最好从自己家里开始,想一想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著书立说,为什么要发表文章。这些东西也是商品,是为了市场而竞争性地生产出来的商品,而且这类商品在交易中也包含着本质上具有灵敏性的指标,以及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的相对重要性。另外,经济学家们的行为也证明了,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

经济学发现自己陷人了一个恶性循环。首先为了得到人们的承认,为了具有影响力,经济学家们堕落到了公众的思想水平;其后,争夺发言权和影响力的竞争取代了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客观研究的努力;最后,在这场竞争中获胜成了取得这一职业成员资格的必备条件。有人说,现在"也许存在"一个经济学职业,它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只对解决问题感兴趣,并以合作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不过,他们争相向公众兜售的并不是他们关于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科学"分歧的努力。这个职业是否已经训练出了社会领导才能?这个具有一般性的问题带来了自由社会领导人概念上的矛盾。如果能由社会公众担当公开竞争中的裁决者,选择他们的领导人,那么,社会公众就是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这正是所谓的民主的要义。因此,指导做事方式的思想是大众思想,个人的作用仅限于提出建议,并且竞争性地推动其理想和计划的实现——如果这类活动能够真正源于个人的话。

XXVİI

XXV

今天,我们依然很难理解在启蒙运动中备受欢迎的政府信念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也许,其主要内容是这样一个信念,即对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的信仰是过于明显的"真理",以至于不曾受到认真的质疑,而且这个信念会把政府职能减少到很小的范围。只要它是集体决策中的一个信念,其合理性就取决于大众的判断力。至于忠诚和能力,人类的一个基本的神秘本能是"喜欢"达到目的的正确程序的提出者,而不喜欢反对者,并且,在作出这类判断时,他们并不理解其中所涉及的观点。竞选的方式应该是严肃对待问题的方式,而不单纯是辩术、搞笑或行贿。但是,就这种情况的本质而言,竞选方式和胜利者必须由公众来裁定,竞选者采取的技术将是那些真正"起作用"的技术。(也许,民主信仰本身也只不过是大众思维,像服装或发型的流行一样,要为其寻求一种理性基础根本就是徒劳的。)

XXVIII

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即从不带有偏见的意义上说,社会公众很少进行"思考"。在政治竞选中尤其是这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之一是,统治过程的发展具有连续竞选的特征,其第一要义是营造大众思维。迎合大众思维的任何东西必定是简单的和浪漫的,其深受拥护的政策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迫害。除了蔑视"经得起考验的经济理论"之外,我们不可能指望会有其他表现,而且即使关于犯罪学这样简单的问题,其认识也相当肤浅。但是,问题一经提出,广泛的讨论一旦开始,"自我平息"就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可能再回过头去不加思考地接受和盲从统治者。民主必定会遇到其潜在的极限,或转而成为专制。

这篇序言的含义是经济学的意义有赖于其密切联系着的制度史的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题目的核心是连续性,以及变化中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角色与理性的、情感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一方面,讲授"幼稚的经济主义"\*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同样不容易的是,像美国

<sup>\*</sup> 幼稚的经济主义 (naive economism) 指 19 世纪末国际工人运动中轻视政治斗争、追求眼前经济利益为特征的一种机会主义。——译者注

这样的"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s)习惯假设而不是习惯行动那样,① 这完全是历史力量问题,② 它来自经济学家的打字员或演说家的手势。在我看来,一旦有理性的或情感的交流,作为基本制度和基本工具的一种,语言就具有一种奠名其妙的重要性,而交流是社会和所有人类生活的本质。在经济学家的一般训练中,不可能包括很多语言学的内容。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也许会想到这些事实。然而,在任何经济学的研究程序中,历史的规律观与分析的规律观之间的争议都会得到强调。除此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行为模式的形成中人们之间无限复杂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有形或无形的、彻底的利益冲突,以及它们与具有同样复杂性的机械的、生物的、神经的和大脑的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过于简单化是一个重大缺陷,而且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备受瞩目的领导人与不善辞令的社会公众一样热衷于简单化。在这些概念之间,像博爱、权力欲和经济利益之间一样,惟一的问题是其中哪一个作为一种理论或社会生活的理想更为荒唐。

这里给经济学家的一个最中肯的忠告:他们关于智慧作用的观点中要有一些能够站得住脚的东西,不要忘记他们的观点与社会大众的观点之间的关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而且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近期人们的反理性主义的态度。社会问题中的确存在着理性的成分,它具有双重作用:技术进步和资源的正确配置,后者正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在任何社会秩序中,无论谁作出影响消费和生产的决策,都存在资源充分利用与资源浪费的区别,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是愚蠢的,而且(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所谓"边际主义"原理也正是理性政策原理。但是,关于具体内容和具体做法,这些原理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再有,从更深层意义上说,值得怀疑的是,我们能够在什么程度上讨论理性的政治政策或政治上的理性。要智慧不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答案,在目前情况下,会使智慧失去意义。社会本身需要科学的态度,它也是一种社会审美态度,与欺骗和公然捏造(这些东西难以经受实验检验,但是,在那些不可能被检验的社会科学中却很容易做到)相对立。即便在给定的条件下,从广义上说,也存在

XXX

XXXX